

赌场。他也知道凭个人能量在当地整不动，特意跑到伪都新京找到警务司长谷口，反映了赌场的问题，经过一番周折，赌场终于取消了，但也惹恼了哈尔滨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的人。王贤伟情知他这个厅长是惹不起他们的，又赶紧与之拉关系，专门派出外号“叶扒皮”的伪司法科搜查股长叶永年，组织了有20余伪警的搜查班，和哈尔滨宪兵队一起活动，赶赴三肇地区参与搜捕镇压抗联十二支队的活动。叶永年的搜查班在三肇搞了一个多月，抓捕270余人，判刑处死者10余人，拷打致死者不计其数，他们残暴得将松花江凿开窟窿，把爱国志士、抗日群众塞进冰水中，活活冻死。1940年末，他又转任伪奉天市警察局长，带领部下大抓“经济犯”，据他自己承认，在1941年一年间，处理所谓违反经济统制案件有5000件，其中有1200件，涉及1300余人被起诉判刑。

由于王贤伟干得这么强横，很得关东军的欢心，随即被调回伪总务厅做次长。1945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濒临失败前夕，他还陪着张景惠去日本东京，送去30万吨大米和70万担食盐，进行“慰问”。汉奸们都说他是“后起之秀”，好一个“后起之秀”，在卖国求荣的邪路上真是“后来居上”呢！

（摘自《汉奸秘闻录》）

## 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

宋伟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了我  
国东北，随即制造了其卵翼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伪满

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更有效地操纵、控制伪满洲国政府，除派出大批日系官吏外，还任用了一批卖国求荣的汉奸，为其殖民统治效力。卢元善就是伪满洲国统治机构中，为日伪政权忠心效力的民族败类，深得日本主子的青睐和信任。他由伪龙江省实业厅长、民生厅长、专卖总局长，一直爬到伪三江省省长、总务厅次长，最后爬上伪文教部大臣的高位。卢元善的官运之所以如此亨通，主要是因为他竭力为日伪政权效尽犬马之劳，唯日本侵略者之命是从，纵观其在东北沦陷时期的活动和表现，便可一目了然。

卢元善，字仰三，1888年（清光绪14年）生，辽宁省金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12年，由日本仙台官城农业学校毕业后回国。先后在金州大学堂、山城镇裕华公司、四洮铁路局等处任职。此时的卢元善郁郁不得志，认为是埋没了他的才干。伪满州国成立后，认为这是他发迹之天赐良机，民族的危亡，亡国奴的生活，这些和他毫不相干，经他的投机钻营，于日伪政权建立伊始的1932年4月，便投身于伪军政部，充任高级秘书。

1934年12月，伪满洲国实行所谓的地方行政制度大改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加强伪满的中央集权，对省一级伪政权实行更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对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针，即重新划分为14省、2个特别市和1个特别行政区。这次地方行政机构的改组，为卢元善带来了升迁之机。同年，卢元善充任伪龙江省实业厅长，“掌管农业、林业、矿业、商业、工业及其它一般实业事项。”由于他在伪龙江省实业厅长任内，积极地执行日伪当局的经济掠夺政策，1935年春，便被授予“勋四位景云章”，上写“办共

同贩卖会、平耀委员会有功。”

1936年春，伪龙江省协和会成立“日满青年会”，卢元善出任会长，日满青年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对青少年进行奴化宣传、奴化教育。卢元善作为该会的会长，完全按日本主子的旨意行事，而且积极地参与镇压爱国学生和教师的罪恶活动。1936年，伪龙江省教育厅所属学校的300余名爱国师生被逮捕，就是日满青年会以反满抗日嫌疑的名义检举告发的。

1937年，卢元善转任新设置的伪龙江省民生厅长，卢元善之所以能得到日本人的如此器重，除了时时表露自己的忠心之外，那就是挖空心思，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谄媚奉承。果然，他上任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日本人在齐齐哈尔办小学，抢夺校址。他以伪民生厅长的名义，下令强行拆除奉天会馆，在此修建日本人的小学校。

1937年，伪满洲国公布新学制，所谓新学制就是缩短修业年限，把原来三三制的中学改为四年一贯制的国民高等学校，并且提倡推行所谓的实务教育，并以德育教育为主，主要宣传“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统治的理论，以日语为国语进行教授。这自然是伪民生厅长卢元善的份内之事，他积极地推行这个新学制，将齐齐哈尔市内的中学改为三个国民高等学校，并分为农科、工科、商科，各学校以实习为主，不上课，都从事劳动，推行实务教育，培养与日伪一德一心，为其忠实效力的奴才。

由于卢元善忠实地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不断地得到“荣升”，1938年8月充任专卖总局局长。

当时专卖总局的任务是执行物资统制，其主要专卖品是鸦片、食盐、火柴、石油、酒精等。当时，伪满总收入为3亿元，专卖总收入1亿元占伪满总收入的1/3。在专卖总收入中，鸦片

收入占一半，日伪当局推行鸦片政策的目的在于掠夺民财，增加财政收入。

卢元善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行鸦片政策，在热河省强令农民种鸦片54万亩，并设立专卖署和缉私队，同时联合省、县、村、屯各级人员协助监督，强迫收购。要求烟农每亩缴15两，如不足量，缉私队和县警察便进行殴打、关押。日伪统治者以低价收购的鸦片，又以高价售出，因而获得大量利润。卢元善下令将收购的鸦片原料，统一送交设在奉天小东边的小型鸦片制造厂进行加工，并指定产品由鸦片专卖署销售。1938年秋，卢元善亲自到奉天视察这个工厂，此厂年产量已达70万两左右，卢对此大为赞赏。

伪满洲国的鸦片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所实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是伪政权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鉴于卢元善在伪专卖总局局长任内执行鸦片种植、专卖政策的“卓有成效”，日伪政权在1939年春又授予他“勋三位柱国章”，以表彰其“在专卖总局，执行鸦片专卖品有功”。

## 二

1939年4月，原伪三江省省长于琛澈升任伪治安部大臣。鉴于卢元善“政绩显著”，对日伪政权“忠心耿耿”，所以由日本人提名，同年4月24日伪国务院会议通过，卢元善接任伪三江省省长一职。卢卖身投靠，甘当汉奸，至此也仅是7年的光景，但他却爬上了伪满洲国封疆大吏的高位，足见其钻营有术，卖国有功。

伪三江省位于东北的东北部，以佳木斯为中心，下属14个县，有勃利、汤原、方正、依兰等，这里的农产物收获占伪满

洲国第一位。这里除丛山峻岭、林深树茂外，还与苏联接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这里的抗日武装力量较为强大，是东北抗日联军最活跃的地区。当时伪满称这里是全国数十省治安最劣之省。卢元善到任后，立即召集佳木斯市及各县长会议，讨论三年计划大纲，确立了“治安肃正计划”，中心内容就是要全力配合日军“对于省下残匪彻底扫荡”。1941年，卢元善以伪三江省之全力，竭力配合日伪军疯狂围剿我抗日武装。抗日将领赵尚志在鹤立县牺牲，杀害赵尚志的凶手，鹤立县县长到卢元善那里请功，卢元善对其大加赞扬，并以他的名义，发下一笔巨额奖金，并命令把赵尚志的尸体运来，在卢的亲自参与下找人确认。当确定为是赵尚志时，卢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除去了“满洲国”一心腹之患，邀功请赏的机会又降临到他的头上。于是，他命令伪警务厅长田中把赵尚志的头割下，装进木匣子，送到“新京”伪治安部请功。卢元善就是这样，用抗日英雄的鲜血来修筑他飞黄腾达的罪恶阶梯。

1940年，伪满皇帝溥仪秉承日本关东军的旨意，亲去日本迎回了“天照大神”加以供奉，并特为此颁布了所谓“国本奠定诏书”。卢元善对此积极响应，为了表示他的恭顺和诚意，又马上率先做出了“省训”，其文为：“尊皇敬神，灭私奉公，举省一心”，并以他亲书“省训”的笔迹大量印刷，发到伪三江省内的各市、县、村、屯，妄图以此来强迫人民承认所更换的新祖宗，从思想上、精神上奴役人民，服从他这个日伪政权代言人的统治，效忠“天皇”、“皇帝”，尊奉“天照大神”。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粮食掠夺，以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实现变东北为“大东亚粮谷兵站基地”的目的，将粮食由严格“统制”变为强制购销，即推行所谓的“粮谷出荷”政策，强迫农民交粮。1941年，伪三江省出荷粮为30万吨，对伪三江省承

担如此数额的“出荷粮”的能力，他的心中十分明白，伪三江省的土地被日本开拓团大批强占，当地农民大量逃亡。加之1941年的降雨过多，是个欠收年，1940年的“出荷粮”才完成15万吨，对这成倍增长的数额，卢是知道难以完成的，农民也是无力承担的，但卢对此无所顾及。从秋收开始，他就命令伪省署的职员和各地的伪警察下乡催促“出荷”。12月初，卢亲自来到汤原县耿贵屯召集屯长催促出荷，他说：“不许私自买卖粮谷，都必须卖给国家”，当时有的农民气愤地说：“省长让不让我们活了”。卢元善却说：“粮谷首先要完成出荷的数量，若不出荷，私自收藏买卖，就是经济犯，就是反满抗日”。伪三江省有卢元善这样的铁杆汉奸省长，广大农民被逼得只好交出几乎全部的收成，连口粮、种子也被强行出荷了，他们的生活只能靠吃糠咽菜来维持。在伪三江省，因出荷而饿死的，1940年就达到5万人，1941年升到7万人。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准备发动对苏战争，搞所谓的“北边振兴”，大批征用劳工，卢元善在伪三江省省长任内忠实地推行了这一侵略政策，共提供劳工93 000人。这些劳工按各县、村、屯人口摊派，并组织大、中、小队队长管理，倘若反抗摊派，就动用警察抓捕、关押、毒打以至杀害。劳工们吃不饱、穿不暖，并且进行高强度的劳动，死亡率很高，使人民深受灾难。

卢元善同时还兼任伪三江省协和会本部长职务，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各县成立青年训练所，为各村、屯训练忠实的日伪政权的中坚分子。此外，还组织义勇奉公队，在地方担任警备传令、防空演习，或监视粮谷移动情况等。每年春季，各县、村、屯协和会代表到县本部开县联合协议会，统一代表的思想，执行“国策”，再由县联合协议会选出代表到省联合协议会。作为省联合协议会本部长的卢元善，便以全体代表的名义拥护赞

成伪满洲国的各项政策，并忠实执行，如粮谷出荷政策、劳工政策等。这只不过是卢元善所采取的欺骗愚弄人民的伎俩而已。

1940年夏，伪民生部选中了卢元善率领伪满中等学校教员40余人去日本东京参加“东亚教育大会”。此时的卢元善既兴奋又激动，兴奋的是日本主子如此信任他，派他率团赴日；激动的是此番东渡，旧地重游，今非昔比。3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留学生，而今却是作为“满洲国”政府的要员前去参加国际会议，他怎能不对主子感激涕零呢。会上，卢元善积极发言，大讲“东亚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关系，极力表示对日本的忠心。在日期间，卢又率领伪满全体赴日人员参拜日本的明治神宫、靖国神社等，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对日本给予伪满的“无私援助”大加赞扬，肉麻地吹捧日本的侵略政策和“赫赫战功”，深得日本各方的青睐。

卢元善在阿谀奉承日本人的同时，对伪满政府中的大汉奸也是竭尽讨好之能事。为了讨好他的前任伪治安部大臣于琛激，特把佳木斯市的西公园改为于公园，并为其立碑，上刻“勋一位治安部大臣于琛激之功德碑”，下刻“三江省长卢元善题”。此碑建成后，又请治安部大臣于琛激到佳木斯举行揭幕典礼。卢元善对自己这个做法甚为得意，于琛激深得日本人的赏识和重用，自己给于树碑，不就等于为日本人歌功颂德吗，还愁得不到日本人的提升吗？

### 三

1942年9月29日，伪满政府决定伪总务厅次长王允卿任全权大使，派驻日本，伪三江省省长卢元善任总务厅次长。根据伪国务院官制，总务厅是伪国务总理的幕僚机关，主要处理伪国务总理主宰的“部内的机密人事、主计及需要的有关事项。”

总务厅长辅佐国务总理大臣，实际上作为伪国务院下属的总务厅，控制着伪国务院，伪国务总理要事事受命于总务厅长。1937年，伪满进行行政机构大改革，总务厅下设内务、外务、兴安三个局，这次改革特别加强了总务厅的权力，总务厅长升为总管“满洲国”一切的“总务长官”，伪满洲国的所有政策、法令、制度等都是根据“总务长官”的意图和经过其同意而认可的。当时，日本人得意地讲，“总务长官”实际上是“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可见，总务厅掌握着“满洲国”的绝对权力。总务厅次长是辅佐总务长官分担掌管伪满全国政务的要职，历任的总务厅次长都是经日本军国主义者精心选拔的，都是与日本军部勾结密切的日系官僚担任，如阪谷希一、岸信介、古海忠之等。最初是次长一人制，后来次长改为三人制，其中的一人由绝对忠实可靠的满系官吏充任。卢元善能爬上这个要职，可见日本人对他的信任已达到何种程度。

此时的卢元善已能直接参与伪满洲国重大决策的制定，并参加由伪总务厅长官主持召开的一周一次的次长会议，即“火曜会”。“火曜会”是伪满洲国的最高决策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成员除了总务厅长官以外，还有总务厅次长，各部次长和总务厅各处长，关东军第四课课长有时也到会。初期，参加“火曜会”的是清一色的日本人，到后期增加了一二名中国人，所谓的中国人也是完全“皇民化”了的汉奸，卢元善作为总务厅次长，是参加这个会议的唯一中国人。他参加通过了伪满洲国的许多政策法令，如1942年11月通过的“国民训”，在“国民训”的最后审议会上，他也极尽了汉奸的谄媚之能事。“国民训”的主要内容有五项，其中的第三项中有一句是“国民立身躬事所必须具有的几种德目，刚毅自立，尊节义，重廉耻，以礼让为旨”，卢元善说，“旨”字中国话不好讲，应改为“先”字，



于是就按卢元善的意见将其改为“以礼让为先”而通过了。并于同年12月8日以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名义公布了“国民训”。“国民训”是日伪从思想上束缚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奴役，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是日伪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

1942年12月，日本大政翼赞会召开日满华协和会议，卢元善以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副部长的名义再度去日本福冈参会，到会的还有伪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北京新民会的代表。会议的目的是日本企图希望伪满与华北、华南各伪政权共同协助日本一道完成“大东亚圣战”，卢元善在会上竭力向主子谄媚，他说：“东亚各国唇齿相关，辅车相依”，赞成日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是日满华的共同责任，并表示，伪满能担负起粮食基地的供给责任，满足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欲望和野心。

1942年是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伪满洲国为此准备举行各种庆典，设立了“建国十周年祝典事务局”，卢元善兼任局长。1942年9月15日，在伪满首都新京的南岭举行了伪满建国十周年庆祝式典，伪满皇帝和关东军司令官等亲临会场，作为“祝典事务局局长”的卢元善是忙前跑后，曲意逢迎，出尽了风头。

#### 四

卢元善十余年的苦心钻营，全力效忠，终于得到了日本主子的最高赏赐。1943年4月1日，为了适应所谓的战时需要，日本人又将伪满的中央机构做了新的调整，将伪民生部文教司升格为伪文教部，任命原总务厅次长卢元善为伪文教部大臣，同日下午2时，伪皇帝溥仪在伪皇宫内的勤民楼为“特任陆军上将邢士廉任伪军事部大臣，及原总务厅次长卢元善任伪文教部大臣举行特任式”。卢元善终于跻身于伪大臣的行列。发表任命，

举行特任式，这对卢元善来说，只是形式上的走过场，因为在此之前，他充任伪文教部大臣一事已在暗中得到了日本人实质性的认可。同年3月的一天，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把卢元善召到家中，对他说：预备新设立文教部，文教是国家的百年大计，以前忽略了，惟独当此时局，更有加强文教的必要，你来当这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听到欣喜若狂，但表面上却表示自己还是愿意在武部的直接领导下干事，但总务长官这样信任器重我，只好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伪满初期原设有文教部，到1937年5月，伪满改革机构时，又撤销了文教部，将其业务并到新设的民生部教育司中。1943年3月召开的“火曜会议”上确定了废止民生部内的教育司，重新设立文教部。再设伪文教部的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条件下“刷新文教、振兴民生”，即为战争服务。

4月1日，也就是卢元善被任命为伪文教部大臣的同时，他便召集伪文教部的全体人员举行“文教部开厅式”。会上，卢元善发表就职训示，他说：“此次文教部之新设，又正有顺应时局之要求也，惟鄙人自愧才疏学浅就任大臣，深恐不能胜任，然既已拜命，亦唯有粉身碎骨，竭成奉公而已，若谈抱负，亦无他道，只愿我国四千二百万国民皆能奉行回銮训民诏书之圣旨，国本奠定诏书之皇猷，实践躬行国民训。”明确表示出要忠实地执行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愚民奴化教育政策。

1943年5月26日，卢元善召开了伪文教部创设后第一次全国文教科会议，卢元善到会训示，会议确定了伪文教部13项施政方案，主要是：学生勤劳奉仕，昂扬建国精神，指导国民教化团体等。紧接着又于同年6月3日，卢主持召开了首届大学校长会议，强调大学的教育尤其要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确定为“大东亚圣战”服务的主要宗旨。当天下午，卢元善率领参

加会议的17名大学校长，“均着协和礼服，仪态严肃，晋宫静待于东便殿。”觐见“皇帝”溥仪。退出帝宫后，卢元善受宠若惊，指天盟誓般地表示，要“集中总力精励取事，一心一意忠诚报国，以期奉副帝旨而迈进于圣战完遂也。”

同年10月又创立了文教审议会，国务总理张景惠任会长，卢元善任副会长，委员是“网罗朝野的权威人士60名”。该会是伪满洲国最高的文教政策审议机关，建立该委员会的目的，卢元善讲得很清楚，是要“致力于教学刷新，学校教育之强化，社会教育及礼教之振兴，以确立大东亚战争下强力文教决战体制。”

为了显示伪满政府对重建的伪文教部的支持，和对奴化教育的重视，溥仪在卢元善的陪同下，视察了“新京”大经路学校、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国立新京工业大学、国立师道大学女子部，观看了学生在翻抄场的实习及军事训练。视察完毕，卢元善对学生们发表讲话：“皇帝陛下矜念文教，不辞劳苦视察学校，对学生有且战且学的训海，学生们应体圣旨，努力前进”。让全伪满学生奉行时局诏书，“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使学生认为战争是自己的事情，或勤劳奉公，或参加军队，鼓励学生充当战争的炮灰。

尽管卢元善深得日本人的信任，又是伪文教部的大臣，但也只是日本人设置的任其摆布的台前木偶，因为伪文教部内的一切事务，均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定夺，卢的权力只是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可是卢对此毫不介意，还经常自我解嘲地说：吃日本人的饭，就是听日本人的话，就得干日本人的事。这正是他那丑恶的汉奸心态的自我表白，他也正是按这条汉奸的逻辑行事的。他是时时注意宣传伪文教部的“政绩”，妄图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1944年年底，卢元善来到伪皇宫，向傀儡皇帝溥仪、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以及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人陈明伪文教部成立以来的种种情况，并着重说明了文教审议会审议文教方案，即以国本奠定诏书的惟神之道为教育方针，加强军事训练，使学生且学且战，在战时体制下，让学生勤劳奉公等。

还是早在1944年4月14日，卢元善即以伪文教部大臣的名义公布了《确立大学战时体制纲要》，明确规定对大学生要强化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以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大东亚圣战”。同时，卢元善又请伪文教部嘱托日本人伊藤大佐专门监督各大学、中等学校的军事训练，并为学校配属日伪军官，确定训练科目，同年秋季，召集各大学学生2万人参加大演习，进行野营、阅兵分列式训练等，以此来适应实战的需要。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每年大中学校的毕业生中，竟有3万人被迫充当伪国兵，开赴前线，成为炮灰。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每况愈下，兵源和劳动力日益不足，日伪政府把在校学生也做为劳动力而加以利用。1942年12月，伪满政府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特别是伪文教部成立之后，卢元善忠实地执行并更加强化了勤劳奉公方针，首先在伪文教部内设学生勤劳奉公公司，并要求各学校把此看成是支援“圣战”的具体措施，在此限制下，伪满各学校广泛开展了勤劳奉公活动。伪满各大学学生2万人，国民高等学校学生16万人，共计18万人被分配到各厂矿无偿劳动，每年一期，6万人劳动4个月，三年内完成。国民高等学校约100万人在地方各省市机关勤劳奉仕，勤劳奉仕的劳动内容十分广泛，有到农场、林场劳动，修筑公路，挖防空壕，为日伪军队打军草等。1945年5月，卢元善亲自视察学生勤劳奉仕情况，后来在他改造期间的交待材料中曾提及此事：“在西安煤矿，看到学生在坑内钻岩

石层，学生个个面黄肌瘦。在阜新煤矿，看到学生在煤层中钻煤，煤尘四起，呼吸困难；在辽阳制麻袋厂，看到学生在尘埃中劳作；在辽阳制火药厂，看到学生有中毒的现象，许多人头痛。据推算，学生因勤劳奉公，疾病死亡率在5%。”卢元善对积极地推行伪满洲国的战时体制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伪满洲国垮台后，卢元善作为出卖祖国民族利益，助纣为虐的汉奸，在长春被苏联红军逮捕，押往苏联。1950年7月被返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病死。

（摘自《伪皇宫陈列馆文集》1991年）

## 伪交通部大臣丁鉴修

安国政

丁鉴修字韩元，生于辽宁省盖平县万家岭。民国初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系。归国后，初期任日语教师，1920年前后，张作霖统治东北时，任东三省交涉署顾问、奉天省财政厅顾问、奉天省公署咨议、中日合办弓长岭铁矿公司中国侧总办（日侧总办是野口），这些差事一直继续到“九·一八”事变。

丁鉴修这个亲日派，据说张作霖平时并不重用他，一般高级文武官员也不重视他。惟当时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对他有些庇护，所以他才能苟延残喘地保持着顾问咨议等无关重要的职位。至于弓长岭铁矿公司总办一席（月薪600元金票，是日币），待遇还很优厚，这完全是日方的力量使他久居此席，这些差事都是闲散不用上班，只白拿钱的职务。平时是这样闲散，